

珞珈国学丛书
研究系列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刘乐恒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

易经（九）：日南西奇并图

北京：一、香港：联城、北京：易经学研究会出版
2018年1月，2018年1月
（北京：易经学研究会）
ISBN 978-7-101-16002-1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ISBN 978-7-101-16002-1

2018年1月1日 2018年1月1日
刘乐恒 著

易经学
易经学心性
易经学

易经学
易经学(16002)
易经学

（北京易经学研究会）

易经学
易经学
易经学
易经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 刘乐恒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珞珈国学丛书)
ISBN 978-7-100-16081-0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儒学—研究②《周易》
—研究 IV. ①B222.05②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2339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珞珈国学丛书)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刘乐恒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81-0

2018年6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60.00元

总 序

我们武汉大学有国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近代以来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瓛、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论与中西学术互动，有深厚的基础。

2001年，我们综合文、史、哲的师资，在国内首先创办了国学本科试验班。此前全国高校尚没有办这样的国学班。我们坚持下来了，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十二年招生。我们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对我国传统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与宗教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一定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科走向，又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的复合型人才。国学班采用“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克服了六十多年来我国大陆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又只有通论、通专史课程而不读经典的毛病。我们强调从认字开始，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文献学外，相继开出《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四书》《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文选》《文心雕龙》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的导读或研读课程，还开了国学通论、国学研究方法论、海外中国学、印度佛学等课程。我们还请人用英语开了《理想国》《圣经》等西方经典课程。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反响。2010年12月，“国学”

II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专业作为武汉大学唯一的人文学实验班纳入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珠峰计划）”，成立了“弘毅学堂”国学班。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学研究和教学，同时为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学子提供继续深造的专业平台，我们于2005年至2007年挂靠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招收国学硕士生。2007年底，我校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行增列了国学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于2008年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这也是国内首创。我校国学硕士、博士点设有：（1）经学研究方向；（2）子学研究方向；（3）史部典籍研究方向；（4）集部研究方向；（5）佛教与道教研究方向。目前已经有两届硕士毕业生，一届博士毕业生。

在十年学科建设的基础上，2010年3月，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打好坚实的基础，又强调开放性，我们常请海内外知名专家给国学班同学上课或做学术演讲。同时，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强调实地踏访古文化遗迹。

武汉大学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本着邓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开拓创新。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为将来留下一点能读古书的人，把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各文明对话。我们的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价值理想、较高的人生境界与认真做事的精神，故学生们一部分成为关心国事民瘼的读书种子，另一部分毕业后从事其他各项事业。他们都感到国学训练使他们受益无穷。我们鼓励学子们做推广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志愿者。他们中有不少人到海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国学班、国学硕博士点、国学院的设立，所为何事？

首先，是对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的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先后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但我们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国学班的教育，是对社会上“国学热”浪潮的严肃的教育回应。

其次，是对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国大陆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主要是原苏联“概论加通史”的模式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文、史、哲的分割，存在一定的弊病。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中西经典的教育与文、史、哲的融通，作为对现有人文学科分科的补充，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原创性的培育。

再次，是对复合型人才社会需求的认识。随着中国逐渐振兴富强，中国文化也在复兴。中国不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在国际上也应该参与到与异质文明，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之中。面对转型与文化复兴，社会将逐渐出现对有深厚国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我们国学院正式成立之后，即谋划出版一套《珞珈国学丛书》，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教材系列，另一个是研究系列。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在我们国学院任教或做过研究的严谨的老中青学者。教材系列是经我们本科与研究生教学试用过的优秀教材，可供全国各高校文科教学选用。研究系列既有学术专著，也有专题学术论文集，书稿都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力图为学术界奉献学术精品。当然，各书文责由各位作者自负。

承蒙商务印书馆领导与同仁的厚爱与支持，经协商，这套丛书

在该社出版。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各级领导与各书的责任编辑同志。这套丛书卷帙浩繁，难免出现问题与瑕疵，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教。

2008年10月，北京，商务印书馆。郭齐勇

壬辰岁末于珞珈山

（此处为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识，疑似为出版说明或前言的一部分）

（此处为模糊文字，疑似为出版说明或前言的一部分）

II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 三、归宗孔《易》……93
- 四、《易纬》阐义……99
- 五、《易》通六艺……105
- 六、总结……109

第四章 常变、体用、翕辟之际——熊十力易学思想中若干重要论题新探……116

- 一、常与变之际……116
- 二、体与用之际……121
- 三、翕与辟之际……126
- 四、反己与外推之际……130
- 五、总结……133

第五章 疏解马一浮与熊十力围绕“三易”而引发的现代儒学公案……136

- 一、总述马一浮与熊十力的三易说……137
- 二、在不易与变易之间……140
- 三、熊马三易之辩省思……149

第六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论唐君毅哲学思想中的《周易》之维……153

- 一、心灵九境与阴阳感通……154
- 二、知识论与阴阳感通……165
- 三、道德实践与阴阳感通……173
- 四、形上境界与阴阳感通……177
- 五、总结……180

第七章 感通与阴阳——唐君毅《周易》研究述要……183

一、卜筮与感通……184

二、观象与修德……189

三、天道与人性……192

四、相继与相感……196

五、太极与生生……201

六、总结……205

第八章 道德的形上学与寂感真幾——牟宗三对《易传》思想的新界说……209

一、牟宗三对熊十力易学思想的继承与扩展……210

二、牟宗三对《易传》思想的定位……216

三、《易传》与道德的形上学……218

四、寂感真幾……227

五、总结……231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文献辑要……233

附录：论孟子的“外推”思想……239

参考文献……259

后 记……261

引 论

《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太极、天人、性命、体用、理气、动静、神化、寂感等重要论题，都以《周易》经传为其渊藪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与《周易》有着互动相通的关系。《周易》经传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以德配天”、“天道性命”、“生生不息”等重要思想，在先秦儒学各大家如孔子（约前551—约前479）、子思（前483—前402）、孟子（前372—前289）、荀子（约前313—前238）等的思想中皆有所体现。宋明理学则是儒学的第二个繁荣和创新的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理学与易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宋代的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杨简（1141—1226）等理学宗匠，或出于应对佛道挑战的考虑，或本于其对天道性命的体会，最终无不从《周易》思想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作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因此根据笔者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说，宋明理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宋明易学史。而作为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开辟阶段的现代新儒学，因其要超化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意义危机，兼回应西方与现代各种思想的挑战，因此也强调借鉴并转化《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中的思想资源，以此建立各自的儒学与易学思想系统。在现代新儒家中，马一浮（1883—1967）的“六艺论”、熊十力（1885—1968）的“新唯识论”、唐君毅（1909—1978）的“心通九境”乃至牟宗三（1909—1995）的“道德的形上学”，都无不与《周易》哲学息息相关。而前三人的新儒学思想系统甚至就是建立在其对《周易》哲学的阐释的基础上的。正是通过将《周易》哲学与儒

学精神进行互动互润，现代新儒学乃得以塑造出其独特、深邃、丰富、简易的思想特色。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对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做出系统深入的研探，那么我们在现代新儒学乃至现代易学史的研究上，则未免有所遗憾。故笔者不揣学识荒疏，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着力。本书的研究虽不能做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然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此书或可作为相关研究第一阶段的基础性、总结性述著，如此则似非无益之事也。

我们辨析与评判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具有三方面的研究意义。首先，这对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意义重大。从整体上说，如前所言，对《周易》经传义理的诠释与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新儒家建立其儒学思想系统的关键性、基础性的内容。因此，专题性地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评价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思想特色与思想位置。而从具体上说，现代新儒学虽然是整全的思想与学术流派，但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取向。围绕这些思想取向，现代新儒学内部亦曾有过探讨与辩论，而这些探讨与辩论有时是围绕易学思想而展开的。因此，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及其内部的互动与辩论，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新儒学内部各种根源性的哲学问题与线索。

其次，这对于易学思想和易学史的研究富含价值。现代新儒学思想不但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转进，而且也是对传统易学的继承与转进。新儒学诸家一方面辨析并阐发了传统易学如《易传》、伊川易学、船山易学等儒家易学的思想与精神，另一方面则在现代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新的义理易学的流派与方向。因此，系统研究现代新儒家

的易学思想，无疑可以揭示出这个新的义理易学流派的内涵、脉络及其在易学史与哲学史上的位置。^①

最后，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可以推进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使之拓展出新局面、新视野。根据笔者的理解，现代新儒学在对《周易》与易学史的学术性研究上应该及不上其他学术流派与研究组织，同时它也并不以继承传统经学作为其最重要的志业，但它通过义理和哲学的角度，对《周易》哲学与易学思想确有推动与贡献。具体地说，现代新儒家要返本溯源，融会贯通，阐发大《易》，标立新思，在现代的背景下贞定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的意蕴与价值，彰显出一个具有生机的人文世界与意义世界。据此，现代新儒家对于这个人文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展示，则多以《周易》哲学中的“感通”、“寂感”、“生生”、“天人”、“翕辟”、“观象”、“乾元”、“不易、变易、简易”等论题为基本线索。新儒家对这些论题的阐发，既塑造了其思想的特色、旨趣、方向，同时也酝酿了中国哲学的新视野、新方法的可能性。例如马一浮通过《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思想阐发出其“本体—工夫论”，熊十力通过“翕辟成变”的思想展示出其“本体—宇宙论”，唐君毅则通过心与境的“阴阳感通”的思想呈现出其“心灵九境”的大系统。这些建立在《周易》哲学基础上的新儒学思想进路，都必将对未来的中国哲学构成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在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方面，在《周易》哲学与易学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

正因为研究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具有上述意义，同时因为现代

① 参见黄黎星：《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

新儒学本身就与《周易》有着内在关联，因此当代学界对于这一论题亦有所重视，并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当然，这些研究在系统性、深度上尚有可推进之处，但其无疑可以成为本书以及我们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现将相关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综述分为整体性研究与具体个案研究两方面。

首先，在整体性研究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不算太多，但皆能提纲挈领、抓住重点，颇具统领性与指引性。这主要体现在黄黎星《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与郭齐勇《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等论文中。^①这些研究（特别是这两篇论文）初步总结出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的若干整体性特征，其中黄氏一文尤为详审。现将目前学界的相关观点凝练如下：一、学派特色。现代新儒学特别重视对《周易》的义理与哲学的阐发，而不太重视象数学与易学史方面的研究，甚至排斥汉《易》象数论与清人所崇仰的“汉学”，因此现代新儒学可称为易学上的“现代新义理派”。这一新义理派以继承和发展宋代义理派易学为己任。二、代表人物。学界普遍将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1904—1982）等视作在《周易》哲学或易学思想史的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大家。三、思想资源。现代新儒家普遍重视并发挥《易传》的意义与价值，其中马一浮与熊十力等人更将《易传》视作与孔子有直接关联的文本。四、释《易》方式。现代新儒学对《易传》进行“本体宇宙论”的解读，与海外汉学的“宇宙演化”和中国大陆的“辩证发展”两种研究角度构成明显的对比；另外，除了“本

^① 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庆中：《中国易学研究在 21 世纪》，《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4 期；黄黎星：《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周易研究》1998 年第 1 期；黄黎星：《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下）——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周易研究》1998 年第 2 期；郭齐勇：《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周易研究》2004 年第 4 期；史怀刚：《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北方论丛》2011 年第 1 期；等等。

体宇宙论”的解读外，新儒家还阐发了《周易》所蕴含的德性义理与实践智慧。五、现代意蕴。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具有对比与会通中西哲学的特色，同时它重视并发掘出《周易》哲学中的体用互涵、生生健动、从体起用等思想维度，以此回应西方挑战，并在现代情景下彰显《周易》哲学的现代性意义。

当然，上述整体性研究尚有可推进之处。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可分出五个方面作推进：一、对于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学界尚未有更深入系统的界说；二、对于《周易》在诸位新儒家思想中的位置与作用，尚需疏通辨析；三、尚未对各家在易学思想上的异同与分歧做出深入考察；四、尚未将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与现代易学史上的其他流派做出充分对比；五、对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与其所继承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先秦易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论述。

二

前文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的研究意义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略作概述。在这里，我们将再作具体性、个案性的论述。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则首先需要界说“现代新儒家”。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划分，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由刘述先先生所提出的。刘述先既是新儒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者。他将现代新儒学作广狭二义的区别。狭义的新儒学被称作“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广义的新儒学则被称作“现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分为三代四群的架构，当中包含了众多人物；狭义的当代

新儒学则仅包含熊十力及其弟子与后学。^①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将新儒家分作广狭二义，确实不无道理。不过相对之下，吴汝钧先生的提法则更为笔者所继承。他认为要能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那么他应可提供出具系统性并有思想分量的论著，以展示出他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诠释。据此，他认为有六位思想家具备这一条件，即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六人。笔者继承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再将之分为三系，此即：思想—政治系，以梁漱溟、徐复观为代表；心性—思辨系，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心性—人文系，以马一浮、唐君毅为代表。^②本书的相关研究将以这一划分为基本的背景和脉络。据此，一些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如方东美等并未纳入本书的研究当中。^③另外，在上述六家当中，马、熊、唐、牟四家的儒学思想与其对《周易》哲学的阐发有着内在的相关性，而梁、徐二家虽然对《周易》哲学与易学思想也有深度的研探，但因为易学思想在梁、徐二氏的学术思想中并不具有重要而关键的位置，因此本书对二氏之易学思想与易学研究不作详探。

在这里，我们应逐一概述当代学界对马、熊、唐、牟四家易学

① 参见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3页。

② 参见刘乐恒：《马一浮六艺论新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334页。按：思想—政治系为谢延荀博士所提出，并被笔者所采纳。另外，杨少涵博士也认为现代新儒家可分为这三系，但他向笔者指出，马一浮、唐君毅一系可名为“仁者型的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可名为“智者型的新儒家”，梁漱溟、徐复观一系则可名为“勇者型的新儒家”。他并认为以智、仁、勇三名分表三系，并非仅就其人格风范而言，而其中可具哲学思想上的意义。

③ 按：方东美先生通过《周易》思想而推演出一套“生生哲学”。“生生哲学”的内涵相当丰富，它融合中、印、西的文化与智慧，契合伯格森、怀特海的生命哲学，创造性地诠释了《周易》经传中“生生之德”、“旁通之理”、“趣时变通”、“宇宙演化”等论题，由此构建出一套以生命为本体的机体主义哲学。不过，就其思想的整体取向而言，方氏是兼通儒、佛、道思想的哲学大家，他倾向采取综合性、横向性的视野与思路，并栖心道家境界。这与马、熊、唐、牟等的纵贯性思路以及明确的儒家立场，构成很大的差异。